

專題論著·譯著

法律、倫理與福利之連帶關係

李宗派

一、前言

人類聚羣而居，彼此分工合作，從事共同之社會生活必須要有一套正式或非正式之社會倫理、法律規則，與福利制度來維持和平之社會秩序與滿足人類生活之各種需要。現代社會之法律、倫理與福利三者息息相關，雖然分為三個不同之學術主題與專業領域，卻具有共同之目標——保障社會之共同利益與增進人類之幸福生活。

爲了探討社會福利之基本理念、人道哲學與改進社會福利之實務方案，有必要事先瞭解法律與倫理之基本概念與特性，然後才能明白法律、倫理與福利之連帶關係。

二、法律之基本概念與特性

管子說：「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規矩繩墨就是行爲標準。商君書云：「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註一）

現代法律學者稱法律者專指一切經由國家立法機關所制定而頒佈於全國來維持社會生活及個人行爲之規範者。法律乃判斷社會紛爭之準則，係一個政治社區中，法院藉以解釋及判決法案之依據（註二）。

從法律學、社會學與心理學之觀點言之，法律乃爲國家所制定或承認之行

爲規則也，也是社會生活上最正式具有條文之行爲規則。

法律有五項基本目的，第一爲規範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第二爲維護社會生活之安定秩序。第三爲解決人民紛爭衝突之標準。第四爲行使揚善制惡之工具。第五爲實現社會正義的利器。

文明社會之法律必須具備三種特性，普遍性、可預期性與適應性。法律之普遍性係指法律所代表的應該是社會大多數人之利益，而非少數人或某一階級之利益。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論是王親國戚、社會權貴或平民走卒，不分性別、種族、膚色、省籍、宗教等等必須受到平等待遇，同等地接受法律之規範功能與賞罰作用。

法律之可預期性爲法律之適用範圍及結果，在未經過法定程序修改前，對於同一事件或同一行爲之賞罰，應該可以預期，這樣法律才有規範人們行爲之積極效果。如果賞罰不明，秩序將亂，法律將失去其規範人類社會行爲之功能。

法律之適應性爲法律之精神及規定必須要與社會正義以及社會倫理相吻合，否則將喪失法律之尊嚴與存在之意義。人類社會變遷迅速，社會正義之觀念、社會倫理之守則亦隨時代改變。但法律條文之變遷較緩慢、較保守因此法律之精神必須具備有適應社會變遷並符合社會正義之原則，否則無法發揮規範社會行爲之作用（註三）。

人類社會除了法律可正式規範人類之行爲與社會關係外，尚有許多傳統之禮教、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倫理道德，在有形與無形中，發揮規範人類行爲之作用，並且具有鼓勵人類去惡向善之功能。

三、倫理之基本概念與特性

倫理者，人倫之道理也、倫理學則研究人倫的常道、人類道德現象的學科（註四）。英文之倫理（Ethics）係由希臘字源之 Ethos 沿革而來。Ethos 之原意是指動物之 Dwelling（居住）或 Stall（畜舍、馬房牛棚）而言。倫理之原意係指保護家畜，使牠們能够遮風避雨，維護安全適舒之措施。當倫理應用於人類社會時，則謂維護人類生命財產之安全與穩定、維護人羣關係之安全。不論是家畜或是人類，倫理是集體生活上不可缺少之安全措施（註五）。

一個社區之倫理就是這一社區之居民感到安全與舒適之交互作用的模式與原則。廣義言之，倫理也就是社會道德之理論與原則，為人類社會所公認的正當之思想、行為原則與理想標準，社會中之個人應該遵從這一行為模式。中庸謂「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倫理者，人倫也，規範人類社會關係，及個人行為之理想原理也。例如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上下有序，朋友有信」等等係中國社會之基本倫理道德，規範數千年來中國社會之人羣關係與行為準則。因此倫理與道德具有下列五種特性：

第一、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含有一種內在義務之觀念。凡是符合倫理道德之事件及行為，人人均有應盡之義務。不管社會上之他人是否遵守倫理道德，自己卻依內心之義務觀念，盡自己力量去遵守。例如在公私機關服務，應該奉公守法，盡職服務，才能符合倫理之標準與道德之行為，儘管他人既不奉公也不守法，又貪污，又枉法，自己卻要堅持信守倫理道德之標準，潔身自愛，盡忠職守才是一個善良之公僕，一個優秀之社會工作者。如朱熹所謂：「盡己之心，謂之忠」也就是盡了遵守倫理道德之義務。

第二、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含有向善之意義。對一個社會團體而言，應該鼓勵其成員追求向善，盡其良知，擇善而行。孔子所謂恕則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均為傳統道德之範例。倫理道德係由內心規範人類之思想言行

與社會關係之理想標準也。倫理道德所追求的是人類社會之至真、至善、至美。凡是倫理的行爲就是道德的行爲，為社會大眾所頌揚與稱讚。凡是違反倫理的行爲就是不道德，為社會大眾所唾棄。因為不倫理與不道德的行爲會威脅到整個社會大眾之安全與舒適，會導向社會罪惡與墮落之危險。

第三、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係由社會文化所決定，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Durkheim）說：「道德命令我們，就是社會命令我們，我們服從道德，就是服從社會」每一個社會有該社會之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例如美國社會一對夫妻不和，丈夫或妻子可以單方提出離婚，既不違法也無所謂不道德，但在臺灣卻是不道德。現代社會之專門職業社團及公會均有其不同之倫理守則與道德水準。例如醫師、律師、新聞記者、社會工作者、護理師、心理師、藥劑師等均要求其成員遵守他們之職業倫理守則。如果其成員不遵守倫理守則或其雇主不遵守倫理守則均可成為法院之訴訟案件，由法院公斷是非，或是加以處罰違反倫理之行爲。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乃為社會文化之產品，非一成不變之真理，隨時代社會之變遷而改變。

第四、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是社會互動之常道。社會之人倫關係，待人接物與社會互動之軌道謂之常道。人的行為能够符合常道則為良善之行爲，也就是合乎倫理道德之行爲。例如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扶弱濟貧是常道也是倫理道德之行爲。仗勢欺人，反叛父母師長之教訓，虐待妻兒，均違反常道，也就是不倫理不道德之行爲。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常道。「強不知以為知」是反常，也是不倫理，不道德之行爲（註六）。

第五、倫理標準與道德行為包括社會價值與個人義務之判斷，前者分別善惡之標準，後者分別正確與錯誤之行爲原則。也就是明辨智慧與愚蠢之行爲，判斷獎懲之基準。在十九世紀時，德國之康德學派（Kantianism）批判倫理哲學之價值理論與義務理論，討論良善為何物？何謂至善？亞里斯多德在其倫理一書中也強調世間萬物為善。但是其他學者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認為良善之定義係隨個人及社會團體而有所不同，因此倫理之良善也隨不同之社會文化，各有差異。不過任何社會，凡是合乎倫理的行爲必合乎良善之原則，為人們所歡迎，使人們感受快樂、滿足。凡是倫理之良善與美德必然是知識

聰明之表現，對於個人與社團之生活，一定有所貢獻。

第六、倫理在理論上可分為絕對之倫理 (Absolute Ethics) 與相對之倫理 (Relative Ethics)。前者係絕對主義之倫理觀，例如斯賓塞 (H. Spencer) 所指：「在理想社會中理想人的理想行為守則」而言，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後者係相對主義之倫理觀，也就是根據絕對主義之理想原則應用於現實社會之人羣關係，作為他們社會互動之準則 (註七)。

西洋之倫理觀念多根源基督教之倫理道德教訓，相信上帝為至真、至善、至美，為個人生命及人類社會之倫理守則。東洋之倫理觀念則根源於孔孟儒家、道家與墨家之仁義道德與兼愛學說，例如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世之要則，天地君親師之人倫關係等等均為東洋社會之倫理基礎 (註八)。

蘇格拉底之倫理觀稱「知識則為美德」(Knowledge is Virtue) 明智之人能辨明是非，分別善惡，擇善而行，則為幸福，係倫理之實踐也。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論語學而)。這些孔子之學說已成為中國人立身處世之理想規範與倫理之準繩。

倫理道德對於個人及社會具有極大之影響力量。蓋倫理道德可以由內心控制個人之行爲與社會之規範，激發人民義務心之自覺，引導其向上向善之心境與意志，保持高尚之品格。倫理道德之教訓可使人們認識人生之真理，表達真誠不虛、真情流露，或加強人們的意志力量，鼓舞士氣，對於該做的事，見義勇爲，對於不義之事，堅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倫理守則，亦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理直氣壯」之倫理道德行為。

要維護真善美及和平安樂之社會秩序必須建立真善美之社會倫理，要創立現代化之專業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制度，必須先建立現代化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才能使從事於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實務之人士，有理想之專業行為規範與守則，藉以服務社會大眾，促進人民之幸福生活。

四、福利之基本概念與特性

福利者，厚生利羣之人道與仁政也。福利是一種倫理哲學，一種理想的生括境界，一種有原則之服務體系，以及一種有法律規章之社會資源分配制度。討論福利，通常是指社會福利而言，其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法國、西德、北歐諸國、澳洲、紐西蘭等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 之社會政治制度，其主要之概念則為一個國家為保障其人民之生活幸福而推行全體國民之保險、國家醫療制度，全民就業計劃，以及福利服務政策使每一個國民自「搖籃到墳墓」都得到自由安全與快樂無憂之生活 (註九)。

廣義之社會福利包括福利衛生、生態保護、社會重建、兒童與老年之保護、青少年之輔導、公共救助、社會保險、雙語教育、身心殘障者之服務、職業訓練、婚姻輔導、心理治療、孕婦服務、領養、寄養、觀護假釋等等凡是改善人民生活，促進人民幸福者皆屬社會福利之範圍。(註一〇)

社會福利制度乃是現代國家與民主自由社會之政治理念與社會政策，也是衡量一個民有、民治與民享之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之重要指標。在世界各地不管是工商業發達之國家或是社會經濟正在開發中之國家莫不急起直追，仿效歐洲及英法福利國家之社會政策與福利服務制度，來建設他們之國家與保障人民之生活幸福。

就現代社會福利之概念而論，一九七七年美國出版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曾引用了美國社會工作師聯合會之定義，稱社會福利是一套有組織之政府與私立機關之公益活動，其目的在預防社會問題之產生，解決已產生之社會問題，改善個人之福利，社團之功能與促進社區發展與進步。這一套有組織之公益活動經常動員了醫師、護士、律師、教師、工程師、牧師、保健師、社會工作師以及其他行業之專門服務，來達成社會福利之目的 (註一一)。社會福利是一個社會倫理與價值觀念之具體表現，透過社會認可之制度、政策、立法，以及行政體系來推行社會服務，實施社區發展方案，改善人民之生活條件，幫助個人及社團追求幸福之人生 (註一二)。

社會福利具有下列五種特性：

第一為普遍性或全民性。社會福利之基本倫理哲學與社會服務體系必須符合全民之利益為原則。為了奠定社會之安寧，增進人民之幸福，一切社會福利

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必須具備普遍性，例如社會保險制度之建立，以及國民健康保險或公醫制度，全民就業政策等等均應依普遍性之原則，使社會中之每一個人均可分享到該制度之利益與服務。

第二為特殊性或選擇性。社會福利制度特別強調社會正義及社會互助，藉以照顧社會上之老弱殘障、婦幼貧病或對於社會上遭遇不幸事故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者，提供公共救助及特殊性之重建服務。因此依照社會衛生問題之性質，創設特殊性與選擇性之福利服務措施，來滿足這些特殊人口之特殊需要，例如兒童、老年、精神病患者、身心殘障者、文盲、犯罪者、非行少年、無業遊民、賣春、酗酒、吸毒者以及非法移民等等之社會服務均屬特殊性之社會福利措施。

第三為專業性。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專業性之特質。社會福利已非古代之慈善救濟以及隣里互助之方式可以比擬。社會福利制度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衛生醫療、教育文化、法律移民、軍事國防、工業科技、保險統計等等制度所涉及之複雜關係，非具有專業教育及訓練之人才，無法勝任其設計、執行與考核之工作。例如兒童福利、青少年社團工作、社區發展設計、學校及法院社會工作、觀護及假釋服務、醫療及精神科社會工作、工廠社會工作、以及軍隊與榮民社會工作等均屬專業之範圍。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均需要社工碩士、社工學士或領有社工師執照之專業人才，始能符合就職之條件。

第四為具體性。社會福利制度含有具體性之服務體系。例如社會保險津貼、現金補助物資之分配、醫療、住宅、托兒、教育、就業訓練以及老人安養等等均為具體之服務措施。社會福利並非抽象之理念而已，係理想之倫理的具體表現。

第五為功能性。社會福利制度具有預防社會問題，治療社會病態與重建社會秩序之功能。社會福利之施行可以維護現代化社會制度正常功能之運作，使社會中之個人不致流落為遊民，挺而走險作奸犯科，破壞社會之安寧祥和。社會福利是安定社會秩序之鎮靜劑。現代化之社會政策與福利措施可以促進社會政治、經濟、衛生醫療、教育文化、法律宗教以及環境生態保護之積極功能。同時透過公平之社會立法可以革新制度，改變社會結構，重新分配社會資源、

財富與決策之權力，創制合乎時代潮流與人民需要之社會秩序與法律制度（註一三）。

現代社會福利制度是一套正式的、社會公認的組織體系具有機關、制度、典章、均依國家之社會福利法律為依據，執行社會大眾所支持之社會政策與立法，透過專業訓練之社會工作人員才與社會福利有關之專業人士，推動福利方案，社區發展與社會服務，以滿足人民之生活需要。

五、法律、倫理與福利之相關性

社會之法律、倫理與福利三者社會生活與人羣關係中，佔有極重要之相關性。就其主要之關係分述於后：

(一) 法律、倫理與福利三者均以人類理性為基礎，以社會正義為原則，以社會契約為方法，藉以規範人類之社會行為，解決個人間與社團間之衝突與紛爭，進一步維護社會之和平秩序，保障個人之生活幸福。三者之社會目的與理想原則係一致的，互為支援，但是在實際之社會生活，其表現方式與溝通方法各有不同。

(二) 法律是人類理性與社會價值之實體規則，具有公權力之強制性與現實性，對於個人行為與日常生活具有外在之制約力。對於違反法律之行為，具有制裁處罰之公權力，倫理是人類理性與社會價值之理想原則。倫理之原則往往缺乏公權力之強制性與現實性，倫理之持守有賴於個人之道德修養成專業社團之自我制約，係一種內在之制約力量。係自我省悟與自我得道之內心定力。社會上各階層、各社團以及各種職業之倫理守則與道德觀念各有差異，不盡一致。因此法律原則與觀念可以統一，但是倫理守則與觀念則不然。

(三) 法律與倫理均為規範人類行為與解決人羣關係之紛爭並控制社會秩序之工具。法律之制定與執行必須符合社會倫理之最高原則，否則為社會大眾所拒絕與破壞。禮記云：「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德以治民」均說明以倫理道德來規範人心增進社會安寧。倫理道德之社會控制係出於自己之意願，由內在義務心之催促與良心之督促，如能使社會上之人人遵行，則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多之法律訴訟與衝突事件。

(四)福利則為人類理性與社會價值之具體措施，具有社會公權力之社會福利法令為基礎，並有一套實施社會福利服務之倫理守則為指標，可供社會工作者與社會福利專業人員所遵循。福利必須要有理想之倫理原則與哲學基礎，更要有現實之法律典章藉以實施具體之社會服務。

(五)現代社會之任何福利方案與社會服務活動必須是符合社會倫理與法律之行為。倫理是社會福利制度之精神，法律是標準，福利是功能。三者之靈活運用才能使社會福利制度發揮其保障人民生活幸福之目標。

六、社會福利與法律之專業關係

社會福利之法律根源於憲法，現代福利國家之憲法前言均有宣示社會福利之精神及目標。中華民國之憲法前言明定「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憲法為國家之基本大法，開宗明義已為社會福利寫下了最基本之法律依據。社會福利之最終目標在於保護民權、發展民權，使一個國家社會能够真正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社會制度，使社會秩序能够得到和平安寧，更要實施社會福利制度來保障及促進人民之衣食住行、育樂、衛生保健、全民就業、社會保險、國民住宅、環境保護等等之福利措施。憲法內容規定了人民之權利，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平等、自由權、人身自由之保障、居住自由、意見自由、信仰、集會結社之自由、生存權、工作權、以及教育權之保障等等均為一個國家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制度應該努力以赴之具體目標。

美國之憲法前言也明示「促進一般之福利」為憲法之精神及目標。日本之憲法前言也明定「政府之行爲或其國政係受國民嚴肅之信託，其權威係由國民而來，其權力則由國民之代表行使之，其福利則由國民享受之，這是人類普遍之原理。」(註一四)

在法律制度與司法體系上與社會福利發生專業關係者不勝其數，茲舉數例說明之：

(一)在司法體系上，法官與律師為主要之法律專門人才，處理法律案件主司社會正義，但在執法過程中，經常需要牽涉到社會福利體系之協助，特別是社

會工作專業人才之參與，如解決婚姻糾紛、離婚協議、庭外和解、兒童監護、少年犯案、領養寄養等等民事或家事案件。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福利措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之角色。

(二)在行政訴訟過程中，社會福利之案主或受益者，提出行政訴訟，則公共社會福利或社會服務機關之社會工作者將為一些無能力聘請律師或辯護士之貧窮案主提供協助，代表他們參加行政訴訟之聽證會，有時代案主到法院申請法官裁決。

(三)在法院社會工作上，社會工作者扮演許多不同之角色：

第一、充任訴訟人或訴願人 (Petitioner) 例如社工師，代表社會整體之利益，控告一些父母親對其兒女之虐待或疏忽，填報請願書請法院判決將被虐待之兒女帶離家庭、交付寄養以及保護服務。

第二、充任被告人 (Defendant) 社工師有時在社會福利機關遭到案主控告，被列為被告人，例如寄養家庭與兒童福利機關發生糾紛，指責社工師對於安置兒童，辦理寄養及領養手續，有失公正等等。

第三、充任代言人 (Advocate) 社工師有時代表案主，上法庭去解釋案主或犯案之當事人所處生活環境，犯案動機，為案主辯解其反社會行為或為其生活需要爭取更多之社會救助津貼。

第四、充任專家證人 (Expert Witness) 社工師以其專業訓練及經驗，被邀請作證，提供專業意見，以證明或證實一些有關社會福利之個案問題，作為法庭裁決之參考。例如養育一個小孩子生活費用，以供法官審判有關賠償過失致人於死亡之金額數字。

第五、協助同事之角色，法院社會工作為司法行政體系之一部份，社會工作者可協助其他職員分擔調查案件收集資料，或受法官之指揮，執行仲裁離婚之案件，幼兒之扶養事項以避免冗長之司法裁判手續，化費許多不必要之訴訟費用。

(四)在家事法庭上，社會工作者往往處理有關兒童福利之親職責任案件，例如依賴兒童、疏忽兒童之管教及養育、身心虐待，以及性虐待等等事故，這些案件均需透過法院之法定程序，裁決後，才能提供適當之社會服務，剝奪父母之親權、監護權及養育權或將兒童送往寄養家庭。因此社工師需要準備案情報

告，代表政府提出解決問題之方案，家長也可聘請律師在法庭上與社工師對辯是非曲直。

(d) 在少年司法行政方面，少年違法與成人犯罪之性質與概念全然不同。青少年侵犯法律及社會權威可稱為非行少年（註一五）或不正當行為之少年，視其違法之程度，給予不同之處罰。經常這些違法少年由警局之少年組處理或拘禁，但一定要合於法定手續。較嚴重者需要提交少年法院審判或聽證（Hearing），在這一過程中，社工師擔任觀護官之角色，從事於案情調查，家庭訪問，提出報告，建議法官將少年釋放交付父母監護，或由社工師親自觀護，或是接受社會服務，心理協談，或是送往青少年感化機關，接受感化與矯正教育。在少年司法行政與裁判過程中，社工師所扮演之角色，對於青少年之身心發展與矯正工作有極其重要之影響。

(e) 在社區心理衛生方面，精神病患之入院治療以及申請出院返回社區生活均與社會福利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發生直接之關係。如果是志願進入精神病醫院治療者，不管其精神病症是否痊癒，可以由自己或家屬通知醫院行政當局自願離院。如果是非志願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醫院者必須經過一定之法律手續，由精神科醫師或社工師填寫病人住院之理由，例如對自己或他人具有危險性等，必須接受強迫治療。如果對自己之衣食住行或對自己的事務失去自治能力或精神錯亂時，醫院需要申請法院指定保護人（Conservatorship）來處理精神病患之私人財產或其他事務。社工師必須經常與法院保持連絡，依照社區心理衛生法規，照顧病人。

(f) 在社會工作專業執照上，社會工作者應瞭解社會立法之原意。為保護案主及社會利益，提高社會工作之專業標準及地位，訂立專業考試及專業執照制度，依法考取執照才能執行診療，社會工作者（Clinical Social Worker）之業務。在法律上訂有考試手續、資格、執照之使用，誤失、過失、失職及瀆職之罰則等等。這些規定都與法律專業直接發生關係（註一六）。

七、社會福利與倫理之專業關係

社會福利本身就是倫理哲學追求實踐之一項大綱目。因此任何社會福利制

度必須建立在社會倫理之基礎上。社會倫理之原則係由社會功利論（Social Utilitarianism）與社會道義論（Social Deontologism）歸納而來。前者稱任何行為之結果對於社會整體利益，具有實用價值與貢獻者均屬之。後者則指個人之倫理原則，對錯觀念並非建立在社會功利主義而是單獨存在的。任何行為之是非對錯有其獨立之倫理判斷，並不一定要使用實用主義之標準來判斷。例如康德之自然法論認為「說謊」就是錯誤之行為，儘管使用「說謊」之行為，使個人及社會完成許多善事，也是錯誤。因為「說謊」本身已違反了倫理之標準。社會道義論主張倫理行為本身是方法也是目的，對於個人有極重要之道德意義（註一七）。

社會福利制度依靠社會工作專業去推動與執行。社會工作之專業人員必須訂立一套具有遠見而且能够獲得共識之倫理守則，才能够提昇社會工作專業水準、地位以及對整個社會有更偉大之貢獻。

美國社會工作者聯合會訂有一套很詳細之專業倫理守則。在其前言就列出倫理守則之精神及目標。其大意为「這個守則係為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日常生活指南（Guide）以及裁決社會工作者之行為偏離本倫理、守則之標準基礎。在專業關係中，這守則代表社工師之倫理行為的標準，規範社工師與其案主、同事、雇主、其他專業、社區與整個社會之專業關係。這個守則訂定社工師之身份、地位、個人行為等之標準。這個倫理守則係基於社會工作專業之基本價值觀念而訂立，包括承認所有人類之獨特個性、尊嚴與價值以及他們之權利與機會。這個守則也基於社工師之特性，而促進社工師的價值觀念。」

社工人員要遵守這個守則，更期望所有社工人員之行為與服務活動能够符合這個倫理守則之文字及精神。這個倫理守則並非日常行為之法規條文也非宗教教條。在複雜之社會生活與專業服務中，個別之行為要以整個守則來衡量，是否合乎倫理標準。整個倫理守則是要幫助社工專業人員發揮最高之聰明才智，貢獻給人類社會（註一八）。

缺乏倫理基礎之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工作專業將變為政府統治者之社會控制工具，對於社會進步將變成一種阻礙。因此論及福利必須具有倫理之基本觀念。

八、結論

法律、倫理與福利三者相關，為一個現代國家社會體制所不可欠缺之三件利器與穩定社會秩序之法寶。一個國家要鞏固國權、保護民權，要奠定社會安寧，要增進人民福利，必定先要建立一套現代化、科學化以及民主化之社會福利制度來保障人民之基本生活，來促進人民之創作發明，以及來支持人民追求幸福快樂之自然權利。要有一套理想之社會制度，必須要有符合時代之倫理精神、原則與目標，以及民主自由與平民化之法律規範與司法體制，彼此配合、互相合作，三者始能同時產生社會功能，促進社會進步，嘉惠社會大眾。

不論是社會工作者、社會福利專業者、法學家或是倫理哲學家或是關心整個社會福利者，應該對於現代之社會福利制度有一番基本之認識，才能在專業關係中保持一種平等和諧之合作關係與倫理原則。

〔本文作者係長堤加州州立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兼國際社會工作研究所主任〕

備註：

- 註一：見商君書定法第二十六，參考孫本文著，社會心理學三四八頁，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二月臺八版。
- 註二：Donald Brieland and John A. Lemmon, *Social Work and the Law* 2nd edition, P. 4, West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85.
- 註三：參考趙守博著，法治與革新，五至八頁，幼獅文化事業公司，臺北市，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三版。
- 註四：Dagobert O. Runes,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15th edition, P. 98, Ethics,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1960.
- 註五：Encyclopedia Britannica, P. 752-756, Chicago, 1968.
- 註六：參考孫本文著，社會心理學三四五頁。
- 註七：Dagobert D. Runes,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P. 100.
- 註八：劉真編，師道，一一十五頁，孔子，臺灣中華書局印行，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七版。
- 註九：大熊信行等編，現代福祉國家論，二一五頁，福祉國家之意義，東京

都至誠堂出版，昭和三十四年九月。

- 註一〇：Louise C. Johnson and Charles L. Schwartz, *Social Welfare-A Response to Human Need*, P. 1-41, Allyn and Bacon Inc. Newton, Mass. 1988.
- 註一一：參考李宗派著，現代社會工作選讀，一四一—一四三頁，臺中市金玉堂印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初版。
- 註一二：Phyllis J. Day, *A New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P. 1-31,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9.
- 註一三：Marc L. Miringoff, *American Social Welfare Policy*, P. 18-44, Prentice Hall, E. C. N. J. 1986.
- 註一四：厚生省社會局監修，社會福祉六法，一〇二—一頁，日本國憲法，東京新日本法規出版株式會社，昭和四十八年版。
- 註一五：塚本哲，清邊史等監修，新版社會福祉事業辭典，七十一—七十三頁，京都市ミネルマ書房，一九七七年三月。
- 註一六：Donald Brieland and John A. Lemmon, *Social Work and the Law*, P. 575-591, Legal Issue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1985.
- 註一七：Thomas M. Garrett, H. W. Baillie, R. M. Garrett, Health Care Ethics, P. 1-5, Prentice Hall, E. C. N. J. 1989.
- 註一八：Frank Loewenberg, Ralph Dolgoff, *Ethical Decis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2nd edition, P. 132-133,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tasca, Illinois, 1985.

參考書錄：

- 一：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by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87, Altner Spring, Md.
- 二：Social Work and the Law, 2nd Edition, by Donald Brieland and John A. Lemmon, 1985, Westpublishing.
- 三：Summary of American Law, by Robert T. Kimbrough,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74.
- 四：American Values and Social Welfare, by John E. Tropman, Prentice-Hall, E. C. N. J. 1989.
- 五：Ethical Decis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2nd edition, by Frank Loewenberg, R. Dolgoff, Peacock, 1985.